

“心忧”与“何求”：《多余的话》另一种解读*

张红春

[摘要] 1935年2月，瞿秋白在福建长汀濯田被国民党逮捕。同年5月，他在狱中写下了备受争议的《多余的话》。目前，学术界关于《多余的话》的研究主要有“解剖说”、“人性说”、“政治说”和“心忧说”四种观点。本文紧扣《多余的话》开场白“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进行解读，其提供的具象是瞿秋白对共产主义事业的矢志不渝，对革命前途与命运的无限忧思及对自己的忧思不能被他人所理解。他希望历史能给予自己一个公正的评判。

[关键词] 《多余的话》；“心忧”；“何求”；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

1934年4月27日，广昌战役失败后，中共中央书记处在瑞金召开会议，会议决定红军主力准备转移。10月10日晚，中央红军被迫开始长征。瞿秋白虽多次要求随军长征，但却遭到临时中央的拒绝，被迫留在江西中央苏区，与留下的红军打游击。1935年2月，从瑞金到上海转移的过程中，在福建长汀濯田被国民党保安团俘获。身份暴露后，瞿秋白自知时日不多，经过慎重思考后，于5月17-22日在狱中写下了著名的《多余的话》，对中共，对国民党，对自己、对后人说了“最后的最坦白的话”^①。6月18日，瞿秋白牺牲于长汀中山公园。据龚景春对《多余的话》进行文本考略得知：《多余的话》原稿已遗失。现今留存下来的是《多余的话》的手抄本，经过其多方面史料的爬梳、对比和考证，认为此手抄本系瞿秋白遗著。现保存在中央档案馆。已被收录在《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7卷附录。^②

一、学术界研究《多余的话》的视角与观点

《多余的话》最早研究见于1935年8、9月间的《社会新闻》，上面刊登了“历史的误会”、“文人”和“告别”三部分内容。^③1936年《西北风》的第9期刊登了赵庸夫的《瞿秋白审讯记》，这是第一篇对《多余的话》的内容作完整介绍的文章。至今为止，学界关于《多余的话》解读已有80余年。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四种：

1、“解剖说”。陈铁健是研究瞿秋白人物的专家。他认为，《多余的话》是瞿秋白的一篇内心独白。文中以书生政治家的双重身份对自己进行深度剖析，既凸显其作为一名中共最高领导人的高风亮节，也展示其作为一名书生的种种矛盾。^④丁玲认为《多余的话》是瞿秋白对自己的一种“忘情地剖析”。^⑤丁守和认为《多余的话》“对自己作了无情解剖，表现了诚

*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4BDJ021)、江西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项目(JD1587)的阶段性成果。

① 《多余的话》，《瞿秋白文集 政治理论篇》(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4页。

② 参阅龚景春：《〈多余的话〉文本考略》，《瞿秋白研究文丛》(第四辑)2010年。

③ 《共魁瞿秋白的多余的话》，《社会新闻》第12卷，第6、7、8期。

④ 陈铁健：《重评〈多余的话〉》，《历史研究》1979年第3期。

⑤ 丁玲：《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见《丁玲选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76页。

实坦率的性格”^①。谢宏则认为：“《多余的话》是写给敌人看的，其实际意图，就是在守住底线和尊严的前提下，试图脱离虎口。为此，他剥离自己与政治的关系，将自己还原为一个‘文人’，对自己进行了严苛的剖析，写下了诸多消沉、伤感和过度自轻自贬的文字。”^②陈江认为，《多余的话》“既没有什么隐晦曲折，也没有什么微言大义，没有什么春秋笔法，更没有什么影射寓意”。《多余的话》就是瞿秋白“最后的最坦白的话”，“内心的话”，其目的是为了“引起全党同志对改造自己世界观问题的重视”。^③

2、“人性说”。朱秋德认为，中国社会缺乏一种对前人的“理解之同情”，研究《多余的话》应从“文学、文化和心灵史的角度来解读和诠释”。^④刘福勤认为：瞿秋白通过《多余的话》在更高层次上超越了“脆弱的”、有旧“文人”积习的、“委曲求全”的自我。^⑤王建科、刘守仁认为，瞿秋白心系革命事业、对革命者予以暗示和启迪，是他思想人格的进一步升华^⑥。虞友谦认为，《多余的话》内容丰富，因其基调均是以人性视角与立场作为观察与思考出发点，所说的完全是自己的话，故与他人的文字形成另类。对《多余的话》作出“叛徒”之认定，是缘于“革命意识形态”和“专制主义片面伦理观”；对之持正面评价、抱同情理解之心的，是缘于人性论价值观。从人性的立场，两者并不矛盾。最终给人们呈现仍是一个率真的有血有肉有情的高尚健全的人格。^⑦赵晓春认为，瞿秋白的文人性格的形成，是由于常年的疾病和虚弱的身体，我们要带着常人应有的理解之情去寻找忧郁背后的一个高贵灵魂与伟大人格。^⑧朱月白认为，“《多余的话》充分展示了瞿秋白身上固有的矛盾性，呈现二元人物的特征。既有中国传统读书人的责任担当，也有自己的困惑与软弱。这既是他悲剧性人生的一个背景，也是他独特人格魅力的土壤。瞿秋白自身的矛盾性使得《多余的话》不仅仅是一篇单纯的个人自白，它也向后来者提示了一个时代与一群人的真实与复杂。”^⑨

3、“政治说”。林勃认为，《多余的话》的写作主旨就是揭露王明路线。它是瞿秋白通过曲折的手法同王明路线所作的最后的斗争。^⑩王哲认为，瞿秋白用《多余的话》表达出“别样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诉求”^⑪。孙果达认为，瞿秋白是为了党和中国革命的安危，不仅对死亡不屑一顾，甚至甘冒“自毁名节”“自取其辱”的巨大风险，写下了《多余的话》。^⑫梁化奎认为，瞿秋白所思考的是关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政党以及中国革命的道

① 丁守和：《瞿秋白思想研究》，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568页。

② 谢宏：《剑走偏锋意为何——关于《多余的话》的另一种解读》，《党的文献》，2013年第2期。

③ 陈江：《〈多余的话〉：瞿秋白的“最后的最坦白的话”》，《江苏教育学院学报》1999年第4期。

④ 朱秋德：《〈多余的话〉之解读史与再解读之可能》，《兵团教育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

⑤ 刘福勤：《〈多余的话〉特弄之处》，《徐州工程学院学报》2007年第9期。

⑥ 王建科、刘守仁：《〈多余的话〉主旨索解》，《南京社会科学》1993年第6期。

⑦ 虞友谦：《对〈多余的话〉认知差异的追问》，《瞿秋白研究文丛》，2015年第8辑。

⑧ 赵晓春：《瞿秋白的文人性格特质探因》，《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试析瞿秋白悲剧性的政治命运种心理学的解释》《心理科学》年2005第1期；《从〈多余的话〉看瞿秋白的人格及人格形象》《徐州工程学院学报》2007年第5期。

⑨ 朱月白：《到底是书生》，《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

⑩ 林勃：《〈多余的话〉浅析》，《徐州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

⑪ 王哲：《瞿秋白〈多余的话〉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早期诉求》，《江苏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

⑫ 孙果达：《瞿秋白说了什么“多余的话”》，《党史纵横》，2018年第5期。

路问题；这些思考已经触及到了人的价值和尊严。它“既是对历史的见证和交代，也是留给后人和未来的”。另外，还有金红、韩星婴的《“多余的话”：三种维度解读的思考》等。

4、“心忧说”。“心忧说”的典型代表是刘福勤。他认为：瞿秋白心忧苏区被毁、革命受挫；心忧党的思想理论、路线政策存在的问题。^①持此相同观点的文章还有周晔《索解历史疑案 试析〈多余的话〉》；季甄馥、张梅毅《革命忧思录——读〈多余的话〉》；吴小龙《生命悲情所成全的人格形象——重读瞿秋白〈多余的话〉》；鞠健、魏本阁《〈多余的话〉之再解读》等。当然，也有学者认为，“真正使瞿秋白心忧的是妻子杨之华的安全和因自己牺牲而给她带来的悲痛”^②孙果达认为，“瞿秋白是在为中国革命和党的命运‘心忧’。”^③王观泉认为：瞿秋白是在为中共中央、中国工农红军以及他的战友们担忧。^④李琦则认为：瞿秋白并不心忧中国革命和中共的前途命运，而是痛惜其自己所从事的政治工作。^⑤

此外还有海青通过引入凯博文“躯体化”概念，从社会根源和文化变迁的层面来分析《多余的话》，其主旨在于揭示知识分子个体在革命潮流中，通过“自我分析”达到自我改造。^⑥陈相因则认为，解读《多余的话》不应该以平常的目光评断来阅读，而要用演戏的方式来朗读，和作者一同进入他的符码和戏码的世界。^⑦

以上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对瞿秋白进行剖析，试图构建出瞿秋白的人生认识和评判。从自我解剖解读《多余的话》，得出瞿秋白是一个诚实坦率的人；从人性的视角对《多余的话》进行解读，以理解之同情的情怀尝试着去读懂《多余的话》，努力着走近瞿秋白的内心；从政治或革命的视度来解读《多余的话》，凸显瞿秋白自身价值与人格魅力；从“心忧”解读《多余的话》，提出了瞿秋白担心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以及爱人杨之华。

通过反复吟咏来体味瞿秋白当时所处环境及内心，不禁悲从中来，涕泪满衫。瞿秋白能承受牢狱之苦，视死如归，令人不堪的是其忧思不能被他人理解，其充满失望的呼号“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这是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尴尬，这是心智高于常人者的悲哀。这种大悲哀诉诸人间是难得回应的，只能质之于天：“悠悠苍天，此何人哉？”反映瞿秋白心中所怀的正是这种难以被世人所理解的对共产主义事业矢志不渝的忧思。本文作者旨在从自己的解读中寻找与瞿秋白内心的共鸣点。

二、瞿秋白的“心忧”

目前，学术界的“心忧”说，主要论述他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身份担忧中共及其革命；以一个丈夫身份担忧自己爱人杨之华的悲痛。而本文作者认为《多余的话》中瞿秋白的“心

① 刘福勤：《心忧书〈多余的话〉》，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1-33 页。

② 林源：《关于〈多余的话〉研究提问》，刘福勤主编：《瞿秋白研究文丛》第 5 辑，中国文联出版社 2011 年版。

③ 孙果达：《瞿秋白说了什么“多余的话”》，《党史纵横》2018 年第 5 期。

④ 王观泉：《凄怨的遗言》，《鲁迅研究月刊》，2008 年第 5 期。

⑤ 李琦：《从“不知我者”到“知我者”——瞿秋白《多余的话》是写给谁看》，《百年潮》

⑥ 海青：《〈多余的话〉与瞿秋白躯体的历史意象》，《史林》2009 年第 6 期。

⑦ 陈相因：《“自我”的符码与戏码》，《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 年第 5 期。

忧”为两个方面：对共产主义事业矢志不渝，对革命前途与命运的无限忧思。

（一）对中国革命前途与命运的忧思

中共六大以后，瞿秋白由于犯有“盲动主义”而被撤职，向忠发和李立三领导中国革命。1929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造成中国经济发生严重困难；同时，地方苏维埃政府建立、中国工农红军发展和革命根据地扩大，革命形势对中国共产党十分有利。1930年5月，蒋介石、阎锡山和冯玉祥爆发中原大战。李立三认为革命时机已到，决定大干一场。同年6月，李立三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决议案。这个决议案全面否定了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认为“准备天津、武汉、上海、广州及各产业中心城市的政治罢工，要准备各省重要城市的暴动……这些都是全国范围内的工作”，认为农村包围城市是一种农民意识的地方观念与保守观点；忽视了中国民主革命的长期性。^①为此，他计划实施“会师武汉”和“饮马长江”的战略；预计在武汉、南京暴动胜利后，苏维埃中央政府定都武汉。^②

中共中央6月会议决议案传到莫斯科以后，7月23日，共产国际执委会通过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即共产国际七月决议）。瞿秋白、周恩来参加了决议案的讨论。会议认为，“中国革命运动的新的高涨，已经成为无可争辩的事实”^③。中国革命“主要的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倾向。”^④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也“承认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方针总的来说是正确的”，^⑤只是在策略上、组织上、工作上犯了部分错误。但“坚决反对在目前条件下在南京、武昌举行暴动以及在上海举行总罢工”^⑥并决定派瞿秋白、周恩来回国召开六届三中全会，纠正立三路线。

1930年8月，瞿秋白、周恩来从莫斯科回到中国。9月24-28日，他们在上海主持召开了中共六届三中全会。根据共产国际7月23日会议精神，周恩来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议决案，批评李立三对形势的错误估计和否认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问题，“遂发生策略上的个别的错误”^⑦；李立三发言承认错误，瞿秋白做了政治总结，即《三中全会政治讨论的结论》。全会通过了两个决议案（《中共中央三中全会对于中央政治局报告的决议》和《中共三中全会关于政治状况和党的总任务决议案》），完全接受共产国际七月会议。决议认为立

① 《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1983年版，第84-99页。

② 《柏山在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上关于南京问题与全国工作布置的报告》，《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1983年版，第135页。

③ 《共产国际执委政治秘书处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1930年7月23日通过）。《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1989年版，第583页。

④ 《共产国际执委政治秘书处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1930年7月23日通过）。《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1989年版，第590页。

⑤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第73号记录》，《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第9卷）中共中央文献出版2002年版第230页。

⑥ 《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共中央的电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9卷，第225页。

⑦ 《恩来：关于传达国际决议的报告》（1930年9月24日通过）。《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1983年版，第344页。

三路线“是和国际完全一致的。”^①但是，在个别策略问题上有盲动主义错误。

结果，2个月后，共产国际得知李立三有严重冒犯共产国际的言论。如李立三公开抱怨共产国际对于长沙事件不是很重视，^②说共产国际执委会不了解中国的具体形势。^③于是共产国际立即改变了原有的看法和认识，给中共中央来信^④说，李立三的错误不是策略上而是政治路线的错误。信中指出，“立三同志的方针有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质”。^⑤同时，电召李立三去莫斯科检查错误。

而在国内，王明已先于中央获知共产国际十月来信内容，他急忙改变其原先拥护三中全会的立场，转而反对三中全会。说立三路线是以“左”倾词句掩盖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要坚决反对这一路线采取调和态度。攻击三中全会及由瞿秋白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指责瞿秋白在立三路线上采取调和态度，三中全会以后，仍在实践中继续执行着“立三路线”。^⑥

三中全会以后，共产国际调李立三到莫斯科“学习”。11月李立三到达莫斯科后，被责令检查。12月初，共产国际东方部根据李立三的检查和三中全会文件，写出了《关于中共中央三中全会和李立三同志的错误报告》，全盘否定三中全会。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完全赞同东方部的意见。主席团在批李立三的同时，实际上矛头已经指向瞿秋白。

11月，米夫来到中国后，直接插手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会议按照米夫的旨意，批立三路线、批三中全会“调和路线”，然后，撤销瞿秋白、李立三的政治局委员，“选举”王明等进入中央领导岗位。而瞿秋白却要按照中央的要求，在四中全会后向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写信，承认自己放了严重错误，是个懦弱、腐朽的机会主义者。^⑦2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再次谴责瞿秋白在1929-1930年，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期间以派别行动来影响李立三中央对王明等的压迫，对共产国际清党动摇，对共产国际极不尊重。瞿秋白欲辩不能，只好再次向中央政治局写了声明书，接受一切指责，说自己陷入了“派别斗争的泥坑”。^⑧

对于王明、博古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瞿秋白认为，自己过去“早就埋伏了后来的祸害。”^⑨这里的“祸害”自然是指中共中央存在着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问题。“秋白是一个正派的人，他没有野心，能平等待人，愿听取不同意见，能团结同志，不搞宗派主义。”^⑩瞿秋白对待党内同志错误的态度是就事论事，从来不搞宗派主义那一套。也就是说，瞿秋

① 《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篇）（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页。

② 中央档案馆：《附：中央临时政治局继续讨论目前政治形势及全国工作布置》（1930年8月3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202页。

③ 《斯托利亚尔给洛佐夫斯基的信》，《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第9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58页。

④ 1930年10月共产国际执委会通过的《给中共中央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的信》。11月16日，中共中央收到此信。

⑤ 《共产国际执委会通过的〈给中共中央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的信〉》，《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1989年版，第654页。

⑥ 王明：《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1930年秋冬），转引自陈铁健：《瞿秋白传》，红旗出版社2009年版，第257页。

⑦ 《致共产国际执委会和中共中央的信》，《瞿秋白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1页。

⑧ 《声明书》，《瞿秋白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5页。

⑨ 《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篇）（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19页。

⑩ 冯建辉：《从陈独秀到毛泽东——中共六任领袖新视角》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63页。

白不是宗派主义者，他在革命中是批判或反对宗派主义的。然而，对于立三路线后所出现党内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对党内不正常的政治生态，瞿秋白深感担忧，却又无能为力。

（二）对共产主义事业矢志不渝

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瞿秋白对共产主义事业矢志不渝，对革命前途与命运的无限忧思，但自己的忧思却不能被他人所理解的。

在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瞿秋白由于对革命形势错误的估计、主张“无间断革命”的观点、采取错误的策略，被党内同志批判为“盲动主义”错误。^①后来，李维汉的回忆直接点出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他在《对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的回忆与研究》一文中认为，瞿秋白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不懂得无产阶级在领导人民大众夺取了政权之后，还需要经过一个在政治上、经济上实行新民主主义纲领的过渡时期；他还否认了当时总的说来中国革命形势是低潮，否认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这种说法是不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也是违反辩证法的；广州起义因为指导思想直接接受了‘左’倾盲动主义的影响而失败。^②如果总结中共六大以来，中共党内对瞿秋白的批判，主要有以下几点：

1、关于“无间断革命”。过去中共党内及学术界对瞿秋白的批判，主要是由于他主张“无间断革命”而犯下“一次革命论”的错误。其实，瞿秋白之所以主张“无间断革命”，主要是为了反对“二次革命论”。因为“二次革命论”是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之间，横穿了资产阶级统治和资本主义社会。当时，大家对“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阶段要到甚么时候完成，他将要怎样快的经过那转变到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③还不太清楚，瞿秋白“无间断革命”实际上是指从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过渡，中间不要插入资产阶级统治或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这样才能避免“二次革命论”，他说中国革命的现状是直接革命形势，但是，中国革命带着长期的性质和无间断的性质，这是马克思所称为“无间断的革命”。正是这种不断革命性质，中国革命就不会形成第二次革命。^④他还认为，中国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间断到社会主义革命，主要是在民主革命胜利后，将要开辟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⑤但是，这还不是社会主义革命。^⑥也就是说这是一个过渡阶段，可能由于他在当时不可能像毛泽东那样明确认识到，这是“新民主主义阶段”，故而被后人错误理解为“一次革命论”。瞿秋白的“无间断革命”论是确保中国革命发展不会发展成资本主义社会，而是走

① 《政治决议案》（1928年7月9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307页。

② 李维汉：《对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的回忆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1983年第3期。

③ 《中国革命的动力及其转变而成社会主义的前途》，《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301页。

④ 《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1927年11月9-10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453页。

⑤ 《中国革命是什么样的革命？》（1927年11月16日），《瞿秋白文集 政治理论篇》（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9页。

⑥ 《中国革命是什么样的革命？》（1927年11月16日），《瞿秋白文集 政治理论篇》（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9-80页。

向社会主义，从理论上解释了共产国际的“非资本主义前途”^①

2、关于“不断高潮”。中共八七会议后，各地民众暴动兴起。山东阳谷和范县一带农民攻取县城、直隶玉田和文安等京东各县农民暴动、江苏宜兴农民群众攻占县城、广西南雄和百色一带农民武装暴动、广东高雷、琼崖、海陆丰等处农民暴动。^②农民暴动不断高潮，相反工人运动持续低迷。瞿秋白在关注农民运动暴动的同时，还注意到了工人运动，“暂时还比较弱。”^③他对这种工人与农民革命运动发展程度不平衡的现象进行了分析。瞿秋白认为革命的客观形势是向上涨和走向高潮，主要指农民运动高潮，而不是指工人运动高潮。因为中国革命只出现农民运动高潮，而工人运动却发展不起来。对于农民运动的高潮和革命高潮问题，很多人是赞同的。李维汉说，秋白同志认为中国革命潮流仍是高涨的。我也赞同这一观点，因为此时的农民暴动已经处于高涨形势。^④可是，当瞿秋白提出了“革命高潮”论时，斯大林却否认农民运动高潮，认为中国革命处于低潮，这样就造成中共党内“不断革命高潮”论是错误的。瞿秋白的“无间断革命”论也理所当然受到批判。中共六大认为：“中国无产阶级实行严重的斗争的时候，农民运动才开始发展（例如五卅运动或上海三月暴动时）。中国工人阶级本来组织太弱，又是很分散的，他的力量并不充分，可是很早就加入政治斗争的舞台，首先受着反动的历次打击，没有得着农民方面及时的赞助。”^⑤

3、关于“盲动主义”。瞿秋白犯了“盲动主义”错误，这是他中国革命中早期错误的主要问题。对于什么是“盲动主义”？瞿秋白给出了定义：靠少数勇敢的中共党员搞暗杀；靠脱离群众的游击战在乡村中杀人放火；不考虑直接暴动的形势与条件是否成熟就盲目号召在大城市暴动，如此不顾群众不要群众的倾向——就是盲动主义。^⑥中共六大指出：所谓的盲目主义就是不考虑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而采取的军事冒险。这种不根据实际情况而实行的武装斗争是不顾群众、脱离群众盲目瞎干。^⑦瞿秋白和中共六大对盲动主义的内涵是非常清晰的，但中共早期理论水平普遍不高，再加上许多地方领导干部大多农民出身，文化程度很低，对盲动主义理解不到位；还有广大农民在暴动中吃了亏，其报复主义很盛行，结果造成了许多盲动主义的现象。比如，在湘南暴动中的盲动现象，湘鄂边初期的游击战争中都犯有盲动主义错误。^⑧当然，瞿秋白作为党的主要领导人，他是反对盲动主义的。早在1927年的时候

① 《中国革命领导权之争》，瞿秋白文集 政治理论篇（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4页。

② 《中国社会的大破裂》，《瞿秋白文集 政治理论篇》（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9-60页。

③ 《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瞿秋白文集 政治理论篇》（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4页。

④ 李维汉：《对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的回忆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1983年第3期。

⑤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304页。

⑥ 《中央关于中国政治现状与最近各省工作方针议决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108页。

⑦ 《机会主义与盲动主义之危险》，《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315页。

⑧ 唐正芒主编：《中共党史简明教程》（上册），湘潭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61页。

他就提出：“应当避免过早的明知无希望的武装暴动的发动”^①。同时瞿秋白对三大起义是盲动主义的说法也是反对的。他在《多余的话》中指出：“贺叶的南昌暴动和两湖、广东的秋收暴动(1927),到11月又决定广州暴动。这些暴动本身并不是什么盲动主义,因为都有相当的群众基础。”^②由于客观因素的存在,尽管瞿秋白已经意识到有盲动现象,但客观上又无法阻止盲动主义的发展。后来由于中国革命的失败,共产国际批评了党内的盲动主义错误。瞿秋白作为中共最高领导人,他不得不承担此由“盲动主义”而造成的革命失败,其后果由瞿秋白去承担。因此,尽管瞿秋白主观上反对“盲动主义”,最终还是被批判为犯有“盲动主义”的错误。

三、瞿秋白的所求

陈铁健说：“瞿秋白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即使不是从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仅仅从普通人的是非标准和道德观念来判断这一切,他也会看穿这场丑剧和悲剧的本质。”^③那么,他在生命最后的时刻,到底有什么要求呢?

(一) 坚守一名党员的基本立场与道德底线——永不叛党

《多余的话》是瞿秋白的临终遗言。正是这份遗言的欲言又止让后人众说纷纭。作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瞿秋白矢志不渝。正如他自己所言,他从年青时就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从此以后就没有改变过。^④有人认为,瞿秋白写《多余的话》是他被捕后,充分流露出一种求生的本意。这种做法对一个共产党人来讲,是一件背离党的事业的大问题。这种说法,看似有一定道理。但是,毕竟无法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

从当时情形来看,根据《救国时报》记载,瞿秋白被国民党军队抓住后,被押送到长汀国民党第36师师部,接着深夜进行严厉审讯,并实施各种酷刑,希望能从他口中得到苏维埃政府和红军的计划和行动。但是,他在敌人炮烙前,毫无畏惧,始终镇静自如。瞿秋白除了说一些中国政府、苏联政府及红军抗日救国等话语外,没有任何其他语言。后来虽然受到极刑,再三昏迷,清醒后不过是闭目呻吟而已。蒋介石知道严刑拷打瞿秋白没有什么用处,于是电令施以劝降之法,并让他住到“优待室”,允许记者采访。但是,瞿秋白态度依然没有什么变化,凡是遇到来跟自己交谈的人,滔滔不绝的说中国共产党主张全国一致抗日救国。一旦访谈者为蒋介石辩解,瞿秋白立即会对他们提出种种事实,批判蒋介石,以致于那些说客竟然无话可说。^⑤从上段文字描述中可见,国民党对瞿秋白是软硬皆施,均不见效。

毛泽东在《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瞿秋白的评价有两处。六届四中全会后,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者占据了党内统治地位,用“调和路线错误”打击了瞿秋白同志。^⑥而实

①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371页。

② 《多余的话》，《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篇）（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8页。

③ 陈铁健：《瞿秋白传》，红旗出版社2009年版，第259页。

④ 《多余的话》，《瞿秋白文集 政治理论篇》（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8页。

⑤ 转引自南田：《瞿秋白先生略传》，《救国时报》1936年6月12日，第3版。参见海清：《〈多余的话〉与瞿秋白躯体的历史意象》，《史林》，2009年第6期。

⑥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64页。

际上瞿秋白同志,在受到打击后还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所有这些同志的无产阶级英雄气概,是永远值得我们怀念的。^①瞿秋白同志“在革命困难的年月里坚持了英雄的立场,宁愿向刽子手的屠刀走去,不愿屈服”。毛泽东再次肯定了瞿秋白视死如归的烈士地位。“瞿秋白同志是肯用脑子想问题的,他是有思想的”^②。

瞿秋白在被捕后萌发投降之意的说法,连当时国民党阵营的人都不认同。“雪华”^③说,像瞿秋白这样历经沧桑的人,到了今天这个地步,对生和死还有什么看不透的呢,这是决不会发生的事情,人们不应该从这些方面去误解他。瞿秋白为何不选择慷慨就死,博得一个烈士的“芳名”呢?反而要在生命最后一刻选择投诚,揭示出自己的虚伪,揭破自己的假面具呢?!^④

从正反两方面的史料足够可以说明,《多余的话》不是投降书,瞿秋白不是叛徒。相反,瞿秋白是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坚守一名党员的基本立场与道德底线——永不叛党!

(二) 与国民党反动派巧妙对抗——决不投降

1934年10月,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央主力红军相继撤离中央苏区,蒋介石又派出10万大军对中央苏区实现全面清剿。11月底,国民政府又进行划区清剿。此时,苏区人们的衣食住行陷于极端困苦之中,而瞿秋白的肺病更加严重。1935年初,中央分局决定转道香港送他去上海就医。1935年2月24日,在福建长汀县濯田区转移途中被地方反动武装保安团俘获。面对敌人的严刑逼供,身受酷刑折磨的瞿秋白仍然坚不吐实,还巧妙地掩护了张亮(有孕在身,项英的妻子)和周月林(梁柏台的妻子)。三天后,瞿秋白等人被押送到上杭县监狱。3月9日,他在狱中写了一个“笔供”,编造了一套假情况,借以掩护真实身份,迷惑敌人。敌人看过这份供词后说,如果情况属实,可以取保释放。但要当地证明或在当地寻觅铺保,以证实确实与共产党向无关系。为了脱身,瞿秋白当即以林琪祥名义给在上海的鲁迅写了信。为了进一步愚弄敌人,争取及早脱出囚笼,瞿秋白化名林琪祥在4月15日,向敌人写了一纸“呈文”。这些“笔供”和“呈文”都是在特殊条件不得不采取的掩护和迷惑敌人的一种方法。当瞿秋白被叛徒指认后,他竟坦然一笑,说:“既经指认,我就不用‘冒混’了。我就是瞿秋白。我在上杭笔述的供录,算是作了一篇小说一样?”^⑤

真实身份被认出后,瞿秋白就没打算活下去,当宋希濂希望瞿秋白能谈点他想要的东西时,瞿秋白说,等我写完以后,就会送给你看。^⑥可以说,国民党叫瞿秋白做什么,他就会答应。但是,他就是不投降。时任国民党第36师师长兼抚州警备司令宋希濂回忆说,“这篇长文写的是瞿秋白对往事的回顾和剖析,而不是对从事革命事业的忏悔,不是国民党事后捏

①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64-965页。

② 《为〈瞿秋白文集〉题词》,《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8页。

③ 原福建某军任政治工作人员的杨幸之,笔名“雪华”。参见龚景春:《〈多余的话〉文本考略》,《瞿秋白研究文丛》,第4辑,2010年。

④ 转引自瞿秋白遗著、雪华录寄《多余的话》,《逸经》第25期,1937年3月5日。参见海清:《〈多余的话〉与瞿秋白躯体的历史意象》,《史林》,2009年第6期。

⑤ 赵庸夫:《关于瞿秋白之种种》附录《审讯记》,《逸经》,民国二十六年七月,第三十四期。

⑥ 瞿爱东:《瞿秋白狱中斗争史》,光明日报出版社2010年版,第30页。

造的那样？”^①

1980年2月，邓小平在五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说，“瞿秋白同志，讲他是叛徒就讲不过去，非改正不可。”^②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曾经认为，对于瞿秋白同志在1935年被国民党逮捕后‘自首叛变’的问题，现在已经重新作了调查。现在党内外都很关心他的问题，调查结论是瞿秋白同志是我们党早期的著名的领导人之一。中纪委通过对他被捕前后的事实进行调查，证明瞿秋白同志在被捕后依然坚持不屈不挠的斗争，因而被敌人锁杀害。^③

（三）《多余的话》是作者希望历史给予公正评判

《多余的话》是在充满失望的呼号“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是在告诉他人，瞿秋白心中所怀的正是难以被世人所理解的对共产主义事业矢志不渝的，也是在希冀历史给予其公正评判。

瞿秋白作为一个具有文人气质的共产党人，他在生命最后关头，坚守一名中共党员的基本立场与道德底线——决不叛党。但是，正是这种文人气质，才使瞿秋白巧妙与国民党对抗而绝不投降。这是作为一个共产党人的底线。本文作者认为瞿秋白矢志于共产主义事业，只有“知我者”才会理解，可这“知我者”是何等样的人：“悠悠苍天，此何人哉？”充满失望的呼号中使人看到瞿秋白真正希冀的是他人对自己正确理解，作一个公正的历史评判。

1935年5月28日，瞿秋白可能已经意识到自己生命即将走到尽头，他给郭沫若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很坦率地说，自己现在已经被国民党俘虏了，这就意味着没有生还的希望。然而，自己早就已经被党清除，也就无所谓从事革命斗争了。现在自己所做的一切就是等待死亡的来临。但是，所有将要发生的这些事情其实都没有什么，他最惭愧的是自从自己退出中央政治局以后，病得十分厉害，以至于好像自己心态发生很大变化，对政治斗争没有办法去尽自己最大努力了。^④这种对党内斗争的无奈感，并没有影响到瞿秋白在生命最后四年间，继续为马克思主义、苏维埃革命和党的正确路线而奋斗。他还很谦虚的说，自己不过是例行公事，做了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毕竟说是“奋斗”，好像是有点自我夸耀。当然，他一想到党在几年前所犯下的“盲动主义”和立三路线的错误，感觉到自己作为党的主要领导人，不会因此而减少自己所应负有的责任。相反，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这种责任就更加重大了。他相信，任何历史的事实是无法抹杀的，他们必须接受历史的审判。瞿秋白自己愿意去接受历史最公正的评判。^⑤

既然瞿秋白想得很清楚，他认为自己在党史上的功过是非，不管是功劳还是罪过，将来必定盖棺定论。所以他也不愿意多说什么了。但是，考虑到自己生前不被人所理解，又忍不住想多说几句，把自己所知道的事情尽量揭露出来。这样的话，可以使后来人在了解自己时

① 汪东林：《宋希濂谈瞿秋白被俘就义内情》，《炎黄春秋》2000年第5期。

② 《坚持党的路线，改进工作方法》，《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78页。

③ 陈铁健：《导读：书生革命者的悲剧情怀》，瞿秋白：《多余的话》，贵州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46页。

④ 徐文烈：《瞿秋白给郭沫若的一封信》，《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2期。

⑤ 瞿秋白：《多余的话》，《瞿秋白文集 政治理论编》（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12页。

获得更加丰富的材料，也可以省去后人很多猜想和考证的功夫。^①

结语

瞿秋白的一生成也共产国际，败也共产国际。他之所以成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个党内有威望的领导人，是与共产国际的培养与提携分不开；而把他从最高位置拉下来，且给予种种侮辱的，也是共产国际所扶持的王明集团所干的。

1927年以前，瞿秋白作为一名普通的中共党员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尝试着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中国的现代社会，研究中国历史的发展。八七会议以后，他积极探索中国革命道路，为苏维埃革命而努力奋斗，与盲动主义作无声地抗争，与立三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他敢于承认错误，心地坦荡。

瞿秋白的一生是悲剧的。因为时代造化，让他一度成为中共最高领袖人物；因为中共不成熟，让他饱受委屈，还要进行残酷地自我剖析。但是，他却从来没有抱怨过莫斯科和中国共产党。即使自己受尽党内无端的批评和折磨，他在临终之前，还心忧中共及中国革命的前途命运，由此所表现出的人格魅力，将永远为人们所推崇。

^① 徐文烈：《瞿秋白给郭沫若的一封信》，《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2期。